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 学习资料

第4期(总第46期)

南通市通州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12年12月

## 本期目录

### ● 【经济论坛】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开局之年政策新信息  
既要摸着石头 也要顶层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 ● 【政治建设】

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十个新论  
——对十八大报告关于政治建设论述的解说  
中国“地方大员”群体特征剖析  
——基于角色与功能定位的思考  
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 ● 【社会视角】

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

---

公积金制度日益凸显碎片化

郑秉文：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亟须顶层设计

● **【文化阵地】**

中国文化思潮的百年嬗变

2012 年十大文化新闻

● **【历史回顾】**

古代地方大员权力演变镜鉴

当年的宋朝为什么能富甲全球？

## 【经济论坛】

#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开局之年政策新信息

刘 铮      王 宇      安 蓓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开局之年,将会实施怎样的经济政策?16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传递出许多重要的新信息。

## 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会议认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继续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立足全局,突出重点,扎扎实实开好局。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两个转变,即从高速增长转为平稳增长,从规模扩张式发展转为质量效益型发展。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正是针对这两个转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认为,“稳”就是要继续稳住经济增长和物价总水平,“进”就是坚决推进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今年9月份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企稳回升的好势头,全年经济目标能够较好完成。但企稳回升的基础仍不巩固,明年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非常必要。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内外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又提出了新要求。”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指出,要把十八大精神贯彻落实好,不仅要使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更要在调结构、转方式、抓改革上取得新突破。

## 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会议在部署2013年经济工作时明确提出,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

“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不是增速问题,而是质量和效益问题。如果

不从根本上解决质量和效益问题,中国经济将始终处于不稳定、不可持续状态。”姚景源说,这次会议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了非常突出的位置,就是要努力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

张立群分析,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是国内外经济形势最新变化的必然要求。原来市场供不应求,必然是低水平规模扩张;当前市场供大于求,竞争越来越激烈,质量和效益对于企业的生存发展乃至对国家竞争力都是决定性的。

### **以化解产能过剩为重点加快调整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有着力点。会议提出,实现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关键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充分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把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作为工作重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市场萎缩,原先通过出口消化的过剩、落后的产能必须调整,不调整没有出路,刻不容缓。

“产能过剩问题尖锐,需要未来相当长时期进行艰苦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指出,目前传统产业和部分新兴产业都存在过剩,部分产业比如钢铁产能过剩非常严重。解决这一问题,要在存量调整和产业重组上做文章,该淘汰的坚决淘汰;要大力支持企业技术改造,以创新引领未来发展。

###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会议强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要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重要任务抓实抓好。

“通过城镇化的推进,既可以拉动投资,又可以增加消费,是推进中国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点。”连平指出,中央着重强调的城镇化,不是简单的城镇化,而是城镇化质量的提高。

连平认为,目前我国城市中有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难以真正享受城市生活。下一步需要做的,就是逐步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市民,既可以拉动经济,又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张立群建议,加大政府公共服务投入力度,逐步

使得户籍所承载的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实现城乡均等化,为户籍制度改革扫除障碍。同时,城镇化不等于大拆大建,要注意城市全面发展,特别是在“软件”和规划管理水平上下功夫。

### 保障民生守住底线突出重点

人民群众对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期待在于生活的改善。会议提出,要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做好民生工作,重点保障低收入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民生既要尽力而为,也要量力而行,守住底线、突出重点非常重要。”张立群说,政府工作重点之一就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而底线就是确保基本民生不出问题。低收入群体是社会困难群体,他们特别需要政府帮扶。而且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和结构调整的推进,可能会对一部分人的就业和收入产生影响,相应的保障工作要早做准备。

张立群分析认为,改善民生一方面要靠加大政府投入,另一方面也要靠勤劳致富和经济发展,不可偏废。

### 明确提出改革路线图时间表

当今中国,社会各界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充满期盼。会议强调,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的提法,振奋人心。这说明今后的改革不会局限于具体事项,而是强调顶层设计;不会零敲碎打,而有通盘考虑;不仅是号召,更会有具体的实施重点和步骤。”连平说。

中国经济在调结构、转方式上遇到的困难,根源在于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政府职能、收入分配、垄断行业、金融体制、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亟待推进。

“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下一步应当通过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激发各类经济主体的活力,使得各种所有制能够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中国经济发展就会有源源不断的活力和动力。”姚景源强调。

(转自2012年12月17日新华网)

# 既要摸着石头 也要顶层设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解读

鲍 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要坚持有效的改革路径，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坚持全局和局部相配套、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是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动力；深化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

在十八大报告强调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后，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对改革的方向、路径做出新的表述，提出了一系列新要求。

## 深入研究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是当务之急

把握当今中国的变化，是改革何去何从的重要依据。

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从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上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 30 多年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改革是最大的“红利”，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

但我国发展仍面临不少风险和挑战。从国际看，全球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充满变数，世界经济低速增长态势仍在延续，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明显抬头，潜在通胀和资产泡沫压力加大。从国内看，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并存，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仍然突出……

“与前一阶段相比,如今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内公共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发展的内外环境变化使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压力不断加大,过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单兵突进’式的改革方式,已经难以适应新形势,也无法应对新挑战,制定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说,“而特别强调深入研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正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

“如果说前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总量,改革阻力小;那么今后的改革则主要是为了提高经济质量,原有的发展模式要打破,原有的分配方式也面临改变,改革阻力明显增大。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应当充分考虑这一目标因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认为。

如今,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所谓的“深化改革”,正是在啃那些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形成的“硬骨头”。推进一项改革,往往涉及多方的利益调整;化解一种矛盾,很可能要触及许多其他矛盾。“在经济深度转型调整、利益矛盾更加突出的背景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就是要把握改革的主动性。这非常及时。”迟福林认为。

“在改革目标中,中央首次提出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要求,这也再次强调了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的必要性。”张晓晶说。他认为,新一轮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来统领,更需要勇气和魄力来攻坚,如果能做到,中国经济将焕发出巨大的活力,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可估量。

### **制定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保障发展目标实现**

改革不能空谈,改革需要实干。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制定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令人振奋。”迟福林表示。他认为,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将这一目标与深化改革开放目标有机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就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时间表”。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面对新的历史任务,改革如果没有大的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

标就很难按时实现。

面对2020年的大考,改革应当与时间赛跑。迟福林认为,要重点推动哪些方面的改革?各个领域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三年、五年、八年分别要达到怎样的改革目标?这些都应当尽快明确。尽快制定清晰、明确、可操作的改革路线图、时间表,有利于把握改革主动权,实施有序改革,实现稳步突破,充分释放改革的红利。

针对当前资本、劳动力、技术等三大生产要素均出现增长放缓甚至下降的突出问题,张晓晶建议,未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理顺资源能源价格,推进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市场化,以保证这些要素得到有效利用。这样,一方面资源能源土地等要素才能得到节约,另一方面,在真实要素成本的“压迫”下,也才能直接推进包括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以及制度创新在内的各类创新发展。

二是精简机构、减少审批,减轻政府行政成本,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三是推进财税改革,特别是结构性减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企业减负,增加有效供给。

四是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形成良好的创新环境。

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已初见端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第三天,全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就传出消息,发改委主任张平明确表示,将实施重点电煤与市场煤价格并轨。煤电两个行业博弈多年,牵涉工业、民生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资源能源改革项目,终于将敲定。

### **顶层设计与人民的首创精神都是必需的**

“摸着石头过河”,一直是中国改革的形象比喻。现在要顶层设计、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是不是就不再允许“摸着石头过河”了呢?

迟福林认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顶层设计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人民首创精神的重要性,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迟福林认为,从改革实际情况看,应当从三方面理解这种兼而有之的必要性。

首先,改革永远都是在实践中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发端于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当前,我国的转型与改革远未完成,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尊重实践、尊重创造的传统应当继续发扬。

其次,改革必须满足实际需要。我国是转型发展的大国,全局和局部的情况存在很大差距,只有对中央和地方、全局和局部统筹考虑,治本和治标相结合、渐进和突破相促进,才能增强改革的有效性。

第三,行之有效的改革,大都是顶层设计和实践探索有机结合的产物,只有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允许摸着石头过河,包容失败,才是尊重规律、尊重实践。迟福林说,过去 30 多年,正是因为有深圳、上海等经济特区争当改革的“先遣队”、“侦察兵”,一大批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的改革政策才得以在全国推广。

(转自 2012 年 12 月 20 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 【政治建设】

# 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十个新论

——对十八大报告关于政治建设论述的解说

许耀桐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为题,深刻论述了我国的政治建设、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系列问题,包含着众多的新论点、新思路。梳理归纳起来,共有包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总要求在内的 10 个重大新论,其蕴涵的要义应予以悉心领会。

## 1.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这对于保证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得以顺利进行至为关键。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道路问题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不能走老路,更不能走邪路。无论是过去苏联传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还是现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发展模式,我们都不应该照搬照套,邯郸学步。我们只能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走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一条新路、正路,是改革之路、民主之路、法治之路、制度之路。坚持走这一条新路、正路,意味着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维护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这一条道路实质是人民之路,它保证和落实人民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是胜利之路,必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 **2. “政治体制改革是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包含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四大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党就坚持了全面改革、多层次改革、广向度改革。因此,把我们30多年来经历的改革,称之为全面改革,把改革取得的成效,肯定为全面改革的成效,是实事求是的和理所当然的。在中国全面改革全局中,之所以要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既是整个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部分,起着关键的作用,又对经济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支撑和保障的作用。毫无疑问,在今后的全面改革中,我们仍然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但在同时,一定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突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我们只有毫不懈怠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体制、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继续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改革方针和策略。首先,政治体

制改革需要积极,我们必须积极地进行谋篇布局。只有积极的谋篇布局,才能发挥政治体制改革的先导作用,领先作用,才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引航导向,开辟道路。其次,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稳妥,我们必须采取循序渐进、逐步深入,由下到上、由点到面的策略。只有稳妥地渐进深入、稳步拓展,才能保持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有序。

### 3. “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主。现在“三个更加”的提法,表明我们要在民主的广度、深度以及质度上来下一番功夫。更加广泛的人民民主,就是要保证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依法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和自由,切实地行使民主的权利;更加充分的人民民主,就是要丰富民主的形式,实行民主的方法、程序、途径等要多种多样,使民主的原则、民主的内涵能够充分体现;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就是发展人民民主主要追求高质量,高品位,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把制度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使民主发展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真正有利于人民当家作主。

### 4. “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民主运行过程中的四个基本环节,这四个环节一个都不能少,少了任何一个民主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民主运行过程中之所以安排这四个环节,是因为人民享有选举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这是法定的,必须依法实行,遵法实行。这四个环节,也可以说是民主的四步走。其中的民主选举是第一步,它产生各级的领导者、管理者,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正当性问题,即“权为民所赋”;民主决策是第二步,决策不光是领导者、管理者的事,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人人都可以也都应该参与决策,特别是重大决策的结果必须听证、公示,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民主管理是第三步,即要开放公共事务,广泛吸纳人民群众加入管理流程;第四步是民主监督,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监督,只有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避免权力腐败。

## 5. “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把“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列在推进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抓好的七个重要任务之首,为什么?这是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并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其他国家机关。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制度,是中国各族人民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它是我国的首要制度,决定着国家的其他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它的实质是支持和保证人民有效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必须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保人大更好地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强化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强化对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的审查和监督。还要加强人大组织的自身建设,特别是选好人大代表并提高人大代表和委员的素质。应该改变和优化人大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要搞好代表候选人的提名推荐工作,选出各方面素质好、具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和国是议政能力的人当代表,不要把人大代表当作荣誉职务照顾安排;要提高专职委员比例,增加有专业知识的专职委员,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科技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 6.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

当代世界各国通行的民主主要有三种形式:竞争民主、协商民主和谈判民主。竞争民主也叫选举民主、票决民主,它出现的是非此即彼、我胜你败,即“一方有得,另一方必有失”的结果。谈判民主是利益各方为谋求利益,避免采取武力冲突而寻求和平解决的手段、方式,谈判双方或多边由于既有矛盾又要合作,因而采取相互间退让、妥协的办法,取得“你我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的结果,它有利于促进利益平衡机制正常、有效运行,也有利于营造和谐环境。协商民主,也称审议民主,主张在多元社会现实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的参与,就决策和立法问题相互交流、沟通,最终达成共识,和衷共济。因此,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商议与共识,其结果是“双赢或共赢,利益最大化”。协商民主应很好地应用于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公民与官员

之间就共同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积极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是当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特别在基层,协商民主更有助于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

**7. “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这涉及到如何正确看待、处理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二者之间关系的重大问题。在现实中,一些党政官员经常受困于这个话题,“是党大?还是法大?”在他们看来,总应该说党比法大而总不能说法比党大吧。因此,他们把党委或一把手的决定、意见,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这样的理解和做法,当然是大错特错了。党是伟大的,一方面鲜明地表现在“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没有党的领导,宪法和法律就难以产生;另一方面也鲜明地表现在“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带头认真执行,这正如党在人民面前“俯首甘为孺子牛”并不说明党是渺小的而恰恰是谦逊的、伟大的那样。如果以为党是伟大的,就是享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自己可以带头任意破坏自己领导制定的法律,可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那么党就一点也不伟大了。党只有严格、模范地遵守了宪法和法律才是伟大的。因此,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说,“法比党大!党要遵法!”而这样说,丝毫无损于党的伟大的、光辉的形象。

**8. “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自从2004年中央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以来,国内学术界一直在探讨什么是服务型政府,衡量它的标准有哪些。现在看来,服务型政府,就是必须以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指导,以公民利益为本位,以公共需求为尺度,把公共服务职能作为主要的或核心的职能,尽最大可能地、公正、有效地为公民提供满意的、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这些要求来衡量,服务型政府要讲四条标准,这就是这次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职能科学,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职能科学地定位于行使公共权力,制定公共政策,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

务,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结构优化,就是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解决机构臃肿、管理分散、权力交叉、职责不清的问题,科学设置和规定政府机构及职责权限;廉洁高效,就是反腐倡廉守清明,勤政为民高效率;人民满意,就是要进行民意测评和满意度调查,经受人民的检验,得到人民的肯定。

### 9. “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这是为了解决我国的权力结构不合理、权力配置不科学、导致权力过分集中以至于失去制约监督而提出来的正确对策,是在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上明确阐述了分权思想和分权主张。一个权力组织和机构,绝不可把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权”集于一身,一定要把“三权”分开。把“三权”集于一身,正是现存权力结构的根本弊端,出现权力“巨无霸”,发生监督“真空机”。把“三权”分开,例如把决策权和执行权分开,就是为了避免决策时考虑执行会不会有好处或者难处,只做出有利于自己利益的决策;把决策权和监督权分开、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就是为了避免决策和执行的过程逃离监督。监督权必须是独立的,凡是负有监督权力的机构,监督权都是用来对别的权力机构进行权力监督的,而不是只对自身进行权力监督,也就是说任何权力机构都要接受来自外部的监督。必须如报告所说的,实行“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组成监督的“组合拳”。只有监督有力了,才能“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 10. “推进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

提出权力运行要公开化、规范化,抓住了权力运行良善、协调的两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求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公开透明,二是规范有序。列宁早就指出,实行民主的前提是公开性,他说:“‘广泛民主原则’要包含以下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完全的公开性;第二,一切职务经过公开选举。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是很可笑的”。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也指出,开放社会就是打破封闭,实行开放也即实行公开。在开放社会中,政治权力向人民开放、公开,这就使极权专制无处藏匿,所以它是极权专制的死敌。

关于权力运行公开的问题,我们党在十七大报告中曾经提出,要做到“村务公开”、“厂务公开”、“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各类公开办事制度”等五大公开,现在看来还不完整,例如,在司法方面没有提出实行“司法公开”,在社会管理方面没有提出实行“社务公开”,而且,十七大报告谈这些公开,是分别地提出来的,缺乏一个整体感。基于此,这次报告完整地提出权力公开的问题,并且将“村务公开”、“厂务公开”、“社务公开”等归结为“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这样概括就讲到位了。

(转自 2012 年 11 月 26 日 中国改革网)

## 中国“地方大员”群体特征剖析

——基于角色与功能定位的思考

桑玉成

据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调查显示,九成以上受调查者认为地方大员在落实“八项规定”中“非常重要”。实际上,作为在中国权力运行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地方大员,不仅在改进工作作风中责任重要,而且需要驾驭地方经济建设、社会治安、反腐倡廉等各个领域的复杂局面,需要具有非凡的综合管理能力。那么,当前中国各地“地方大员”有着怎样的角色和功能定位?他们的行为有着哪些特点?承担着哪些重大责任?

### 对地方大员群体的几个基本认识

在我国,所谓“地方大员”,主要是指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担任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人员。这些人员总量不多,但地位显赫,责任重大,对于我国的社会稳定和发 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的“地方大员”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大员。我国实行的是单

一制的国家结构,只有一个中央政府,这样的中央政府下属若干地方政府。单一制条件下的地方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中央政府的授予,国家权力的基础在于中央政府。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地方大员”是中央政府“派出”的地方大员。这是考虑其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的重要基础。

我国的“地方大员”具有职务流动性的特征。正是由于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同时也由于我国特定的干部制度,我国“地方大员”的职务流动性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这种流动性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一些地方大员来源于中央有关的职能部门;二是地方大员在地方间的平级流动;三是地方大员向中央层级的晋升性流动;四是下一级地方官员通过晋升成为“地方大员”。这种职务流动性特征既有政治战略上的考虑,但是同时,这种情况对于地方大员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也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地方大员”与“部门首长”虽然级别一样,但却具有完全不同的角色和功能。在我国的干部体系中,干部的“级别”重于“岗位”,级别相同,地位就相同。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地方大员与中央政府的部门首长具有同等的级别,但是其角色和功能有不同的定位。相对而言,部门首长的职能领域要小于地方大员的职能领域,地方大员的责任要强于部门首长。这种联系和区别也是考量地方大员之角色定位和功能定位的重要因素。

### 地方大员的角色特征

公共性,能够放弃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全社会利益的视角来制定公共政策。恩格斯在其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称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公共权力,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地方大员作为地方公共权力的执掌者,应该时刻遵循公共性的原则。而所谓公共性,主要是指地方大员所掌握的公共权力必须代表社会的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权力主体的公共性特征要求其放弃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全社会利益的视角来制定公共政策,实施其公共管理。

服务性,能够有效地提供教育、环境、治安等公共性服务。所谓服务型政府说明的正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角色定位。根据这样的角色定位,地方大员所主导的公共权力结构便有责任向社会提供良好的公共物品服务。公共



物品是无法进入市场领域进行配置的物品。在现代社会,最为重要的公共物品包括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公共教育、环境卫生、道德风尚等。可以注意到,这些物品的供给状况和供给水平,完全可以反映其供给者即地方大员的职能和责任的到位情况,更能够反映地方大员的执政水平和绩效。

道德性,能够改良社会道德风尚。地方大员作为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执政者,其既然执掌着社会的公共权力,掌控着社会的公共资源,履行着社会公共管理的功能,那么就有义务和责任引导社会的文明和进步,特别是实现社会的道德升华和社会风尚的改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社会成员道德水平的普遍提高,因为只有社会道德风尚的改良,才能为人与人的和谐奠定坚实的人文基础。而在这方面,需要地方大员作出积极的努力,这既包括执掌权力的主体对于道德秩序的尊重和维护,也包括地方大员统帅其政府及其官员对于社会道德行为的实践和引导。

整合性,能够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使得社会所有阶层和所有成员均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现代社会是一个结构、价值、权力、利益等多元的社会,整个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系统。尤其是在利益高度分化的今天,地方大员领导的政府有必要加强其整合性的力量,协调好各个阶层的利益,满足各阶层的需求。小康社会的一个必要基础就是社会的所有阶层、所有成员均能够各得其所,而且也只有各得其所才能够各安本分。社会多样性、多元化的事实表明,在任何社会以及任何时代,人类都无法消除官民的分野和贫富的差别,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和谐生存,正是需要执掌公共权力的主体通过其公共性的力量,来整合不同的利益、抑制利益的分化、平抑利益的差别、顾及利益的平衡。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使社会所有阶层和所有成员均能够各得其所、各安本分。

### 地方大员的责任与作为空间

代表中央,执行好中央的政令,维系好国家宪法法律在当地的实施。如上所述,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地方的权力来源于中央的授予。因此,作为地方大员,其一个非常突出的身份,应当是中央派往地方的代表。这种角色定位就决定了地方大员必须严格执行好中央的政令,并以地方最

高权力主体的资格,维系好宪法和法律在地方的实施,确保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也偶有地方大员忽略全国之大局,善于立地方山头,以维护地方利益为幌子,搞形形色色的地方主义。这是有违单一制国家之基本原则的。

创设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将政府的职能定位于如下四个方面,即: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应该指出,这样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并不是所有层级的政府都没有区别的职能。作为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政府,是仅次于中央的重要权力层级结构,应该着重于宏观调控、市场监管等领域的职能,并敦促其所辖地方政府更好地履行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职能。为此,地方大员就有必要创设良好的制度和政策,提升其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的能力,以此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环境。

以积极的价值导向和管理导向,维系良好的社会风尚,担负起培育好公民的重要职责。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表明了一个重要价值取向,即社会的发展并不仅仅体现为甚至也不主要体现为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而一定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的协调发展。尤其是,社会作为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人的知识和道德素养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基础。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较多地关注了物质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忽略了人的基本素养的培育和维系,使得诚如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这是需要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将培育好公民作为地方大员的重要责任和使命,具有长远和战略性的意义。

(转自2012年12月28日《人民论坛杂志》)

# 现代政治观的思维模式障碍

王长江

与其说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重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没有向执政党思维转变的问题

中国确实需要树立现代政治观。理解和把握政治问题如果没有新的思维,许多问题难以推进,很多问题无法解决。遇到问题绕着走,可能绕着绕着就又走回老路。前段时间,温总理提到要防止“文革”思维重现。这种重现在我国并非没有可能。

## 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

什么叫政治观?政治观是在一种理论指导下对政治的看法。用世界观来分析政治就是政治观,分析历史就是历史观。所以,应该是理论决定“观”,而不是“观”决定理论。如果不这样理解,就无法正确把握理论和“观”的关系。就政治而言,如果说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理论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是因为缺乏现代政治观,那么是不是确立现代政治观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了?这样推论下去是无解的,因为这样是把问题搞颠倒了。我认为,与其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因为没有确立现代政治观,不如说我们整个理论思维模式还存在较大问题,说到底还是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转变没有完成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领域都有所表现。

改革,不能指望事先就有一套完整、详尽的理论。美国搞民主,并不是先弄清了民主的内涵、外延,哪些是系统的,哪些是不系统的等等才开始行动的。相反,他们只是在实践中觉得可用就用了,后来人把这些做法概括总结起来,加以提炼,才形成了民主的理论。例如,当“五月花”号驶往北美大陆的时候,大家考虑到达后怎么去占地:是否谁块头大、力气大就可以多占?

是否谁厉害就可以赶走别人？恐怕不行。为了不致混战，大家认为有必要定下规矩。于是大家坐下来商量，定下规矩上岸后就按规矩办事。这是什么？这就是民主。在意见充分协商之后大家执行，这不就是民主吗？设想先有民主的定义和概念，尔后才有民主实践，那是可笑的。确立观念更不等于所有问题便迎刃而解，那是不可能的。总之，可以有战略性的顶层设计，可以有理念、有目标，确定改革的导向和边界，但不能简单地从概念出发。

### 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

十六大报告曾经明确提出了党的历史方位的深刻转变：由“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革命党）成为一个领导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执政党）。”这说明，我们党认识到了革命党和执政党的重大区别。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个转变无论是从思想上、理论上、理念上都没有完成，确切地说，这个转变正在进行过程中。革命党思维始终若隐若现地影响着我们对现代问题的思考，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我们会经常掉到革命党思维模式中。革命党思维造成了对很多政治问题，包括对民主问题认识的误区。革命党思维向执政党思维的转变迟迟不能完成，有两个原因。

一是思维方式有问题。中国从接受苏联模式之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就开始被曲解了，实践渐渐变得不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理论成了检验真理的标准，唯理论“马首是瞻”，用书本的结论去衡量现实。搞计划经济如此，犯的很多错误也源于此。比如，在处理党政关系上，权力高度集中，实行一元化领导等等，说到底都是从苏联人解读的所谓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出发的结果。如果老百姓对我们的决策不满，就认为百姓是落后群众；老百姓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就说他们只看到眼前利益，而党代表的是长远利益。理论成了判断实践的标准，必然要犯教条主义，这种情况直到现在都有一定的普遍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对传统理论有所突破，但突破的大多数只是观点，如市场既不姓社也不姓资，股份制既不姓公也不姓私，资本主义可以用我们也可以，等等。但这仅是观点的突破，并没有提升到整个理论的高度。因此当遇到重大问题时，我们往往又会回到到底是根据既有理论判断实践，还是根据实践来发展理论的纠结中。

二是利益问题。我们有一套从苏联人那里秉承而来的理念,并据此设计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在运行过程中低效,逐渐失效,走进死胡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只是效率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既有的权力配置会沉淀出不同的既得利益,不合理的体制会沉淀出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产生既得利益。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当改革涉及利益分配时,体制内一些人和部门想的不是正义在哪里,而首先想的是我的利益怎样才能免遭削弱和损害,而且往往到意识形态中去找理由。比如,在不少人的头脑中,加强党的领导、不能“削弱”党的领导,其实只是加强部门权力的代名词;“不能违反党管干部的原则”,实际就是在干部问题上保留部门和少数人说了算的权力。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对既得利益的极力维护。不调整、不打破这些既得利益格局,重新配置权力,就没有办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确切地说,打破既得利益格局本身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本质。

### 两套理论并存,却缺乏系统梳理

我们刚才讲到革命党思维难以转变的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观念产生了体制,体制维护着利益,利益反过来又固化着观念。现实就是这样:体制沉淀出不合理的既得利益格局,既得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回过头来又对深深打上苏联模式烙印的传统体制起维护作用。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有利于高度集权、党管一切,但是妨碍了社会发展。从表现上来看,党的执政地位坚如磐石,但经济发展不起来,最终必然影响执政党的地位,也正因为此,邓小平才提出要搞市场经济。

但是,问题也就随之出现了:市场经济的起点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计划经济的思维恰恰是不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由于压抑人对利益追求的思维与战争时期对人们的要求相合拍,因而从革命党转到领导计划经济的党感觉很顺,用革命党的思维思考问题理所当然。革命时期,人们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有时应当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献出生命,来为夺取政权这一共同目标而奋斗,这是讲得通的。到了计划经济时期,人们也是为实现一个既定的目标而奋斗,大家都无条件地服从这个目标,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思维仍然管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计划经济党与革命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强

的继承性。从某种程度上说,计划经济思维就是革命党思维在建设时期的具体表现。

与此相反,市场经济则首先是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以此为起点,它会产生自己的逻辑,形成一套自己的理论。当然,这中间有许多内容是西方国家发明的,因为人家的市场经济发展走到了我们前面。但从本质上说,这些东西尽管带有西方的色彩,却是所有市场经济都必须遵循的规律。于是,我们面前就摆着两套理论:一套以否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另一套以承认人对利益的追求为起点。两套体系,起点不同,逻辑不同,不少结论也完全相反。这两套东西共同存在,显然存在矛盾。对于我们这个执政党来说,两者择一会很难:既不能回到计划经济,也不能全盘接受市场经济理论,完全抛弃自己的过去就失去了根。但要把二者融合起来,就需要进行系统的梳理,弄清哪些是过时了的、需要剔除的,哪些是可以进一步发展的。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对与发展市场经济直接相矛盾的那些部分,该放弃的放弃了,该否定的否定了,但对全部理论,却缺乏系统梳理。结果,遇上政治问题或经济问题时,人们可以为了各自的偏向,在同一个执政党的理论中找到完全不同的依据,理论本身充满了矛盾。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推进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依然有不少人在用计划经济思维思考政治体制问题。这种依据在我们党的理论中是存在的。总之,两套体系在运作,是造成我们认识混乱的重要原因。

### **现代政治观的内涵就是如何理解民主**

无论是对执政党理论的系统梳理,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实践本身的推进,都有相当的难度,原因也在理论和实际的复杂掣肘。大多数人都说民主好,但又为什么做起来容易畏首畏尾?其实,并不是理论上搞不清楚,而是因为既得利益在背后作祟。传统理论和体制的背后,都有既得利益的支撑,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它使我们在改革面前往往面临选择,其实就是政治勇气的问题,就是我们党有没有决心和勇气打破现有权力配置格局,打破既得利益的阻挠。这是关系到整个党的前途的问题,应当从保证党长期执政的高度来决断。

说到现代政治观,实际上主要还是一个怎么理解民主和民主政治的问题。总体上看,我们过去较多是囿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过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忽视了政党执政活动的一般性规律。规律反映事物的本质,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而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这些说来谁都懂的常识,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在民主问题上却时常得不到认可,甚至成了禁区。例如,民主政治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很多原则,这些原则背后往往是西方国家的长期实践,往往带有很强烈的西方色彩。然而,并非带有西方色彩的东西就一定是西方的东西。事实上,人类社会积累的许多宝贵财富是人类共同财产,但往往谁发明的便会更多地带有谁的色彩。去除这些色彩,看到它本质的东西,而不能因为带有它们的色彩就简单地拒之门外,这才是科学的态度。这仍然是思维方式的问题。革命党可以一闻到敌对阶级的味道就提高警惕、防止渗透,以保纯洁,但如今执政了还依然如此,肯定不行。我以为,讨论现代政治观,最重要的意义概在于此。

(转自《人民论坛杂志》2012年总第380期)

## 【社会视野】

# 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

李 军

1999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到达10%以上,开始进入老龄社会。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78亿,占全国人口比重为13.26%。2011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85亿人,占总人口的13.7%,占全球老年人口的近24%,是全球惟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

“十二五”时期,中国将迎来第一个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年均增加 860 万左右。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达到 2.21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6%。而到 2020 年,老年人口将达到 2.48 亿。

对于中国老龄化问题,中国社科院数技经所经济系统分析室主任李军认为,短期来讲,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不仅不现实,相反是加快了人口红利的减少,因为这将使人口抚养比在短期内快速提高,也就是非劳动年龄人口短期内将增加过快。

从长期来看,多生孩子增加劳动力,有利于改变人口结构,但其主要意义并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以及促进经济增长,而是改善“倒金字塔”的家庭结构,有助于缓解相关社会问题,增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健性。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将主要靠技术进步。

而且,从长期看,老龄化将是一种常态。即使多生孩子,也扭转不了老龄化发展的趋势,因为存在另一种能够平衡多生孩子的因素,就是人类预期寿命将不断延长。

中国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有无可能通过发展老龄产业来促进形成经济增长?为什么难以像发达国家以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 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稀缺性上升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是宏观的,但是从具体来看,这个趋势如何发展?

李军:老龄化对养老、社会保障带来的压力,可能是目前人们最能直接感受到的老龄化效应。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面来认识老龄化的影响,那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老龄化对经济影响的核心性问题是,老龄化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与活力。

一些具体的表现是:老龄化提高劳动力稀缺性,减少劳动力供给,降低国民储蓄,增加企业及家庭负担,加大政府财政与社会保障支出压力,降低以低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贸易比较优势,同时老龄化对房地产、资本流动乃



至金融体系等都有系统性的重要影响。老龄化影响经济的机理是：老龄化深刻改变原有的经济资源配置关系，从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这些影响已经有了一定的验证，比如当今发达国家不断出现债务危机，虽然其导火索可能是银行系统、政府运作失误，但是都可归结为一个基础性的重要背景就是人口老龄化。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乏力，收入增长抵不上支出需求增长是产生债务危机的基础性原因。

比如提高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比如从 60 岁提高到 65 岁，甚至是 70 岁，能够形成统计意义上的老龄化程度下降，但是老龄化引发的相关经济社会问题并不能由此而消除。显然，一个人活 80 岁与活 100 岁，其所花费与占用的经济社会资源是不同的，这与如何定义老年人口的年龄标准无关。

老龄化对发展产生的压力，决不意味着相关的问题就可以自动得以解决。例如，老龄化程度提高而导致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并不等同于就业机会增加，不等同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增加，反而容易导致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出现。即，一方面经济中需要大量高质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而无法满足；另一方面，大量需要就业的劳动力因满足不了工作岗位的条件要求而无法实现就业。

《21 世纪》：人口老龄化影响各方面，您认为有什么办法能够消除一下这些影响？

李军：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完全消除老龄化的影响。但是，积极而有效地应对，能够在较大程度上缓解或部分消除老龄化的负面影响。

“十二五”期间，我国 15 岁 -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将出现由升转降的拐点，这个拐点出现之后，在未来几十年内该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将持续下去。预计到 2050 年，我国 15 岁到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将下降到 7.1 亿人，比 2010 年减少约 2.3 亿人。

人口红利主要指一个国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相对较大，非劳动年龄人口（未成年人与老年人口）的比重相对较低，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状态。对此，可以通俗地理解为经济中“能干活的人”相对多，“吃闲饭的人”相对少。如果这种人口结构出现了变化，比如出现“能干活的人”减少，

而“吃闲饭的人”增多的情况,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减少。按此意义,人口红利是由人口的年龄结构决定的,因此是客观的,现时是无法改变的。虽然可以通过提高劳动力质量弥补劳动力数量的减少,但这种情况应属于技术进步的范畴,而不是延长人口红利的问题。

《21世纪》:机器人(24.960, -0.04, -0.16%)可以缓解劳动力短缺,提高生产率,使得人工服务问题解决吗?

李军:当然,机器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人的替代进行服务。但是,机器不可能完全替代人,而只能在特定的局部范围内实现替代。从总体上看,机器永远都无法完全替代人的劳动,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减少的问题。

老龄化对服务业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老年人增加,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也增加,尤其是对照顾、护理等人工服务需求增加。而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对人工服务业有更大的制约性,甚至有可能出现有钱也买不到服务的情况。

### 老年产业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点

《21世纪》:老年人退休后返聘,开发老年人的潜力,是否会促进经济增长?

李军:让更多的老年人参与经济活动,当然有利于经济,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方式。开发老年人潜力的意义并不在于增加劳动力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意义

更主要是尊重老年人的价值,满足老年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事实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情况,以及经济对就业的容纳量情况,与产业发展的模式及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不是简单地延长退休年龄或返聘老年人的问题。

劳动力减少,似乎减轻了就业压力,就业问题好像就容易解决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因特定的产业需要特定类型的劳动力,不是一刀切地在总体上提高退休年龄,就可以解决具体产业发展所需要劳动力的问题。这里存在着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的就业结构,能否互相匹配的问题。比如,按现行美国的产业结构及产业技术水平,也就是可容纳约两三亿人的就业,如果中国

现在拥有同美国一样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技术水平,试想如何容纳下七八亿人的就业?因此,未来在中国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劳动力是否短缺,与产业发展的情况有很大关系,不能简单地说劳动力是否短缺。

这实际上涉及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面对人口老龄化与就业问题,经济转型并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与老龄化的进程相适应。如果转型过慢,现有增长方式不可持续,无法实现经济适度快速增长。模拟测算结果显示,如果现有产业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地向技术与资本替代劳动方向发展,2030年后中国劳动力供给将出现严重不足。但是,在当前中国劳动力绝对数量仍很大的情况下,如果转型过快,容易出现劳动力结构性过剩的情况,不利于增加就业。

《21世纪》:这样看来,有些产业会不会就慢慢消亡?

李军:劳动力具有流向工资高、待遇好的岗位的内在动力,因此劳动力稀缺性上升将促进劳动力对高工资的追求,一些缺少竞争力的产业,包括缺少对劳动力吸引力的产业,出现消亡的情况是很有可能。

对于企业来说,要及早应对这种情况,从劳动力密集型逐渐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应是未来的主流方向。但具体企业的转型是微观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有一定影响,您怎么看待中国未来10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

李军: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根据在一定条件下的模型模拟测算结果表明,2021-2025年期间,人口老龄化因素可使中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约2.2个百分点。

当前中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阶段,在此阶段适度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是合理的、恰当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涵是多元的,单一的指标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老龄化因素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不大,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其影响效应将不断显现。短期内需要关注的老龄化影响,主要是对劳动力稀缺性的预期可能会不断增强,进而容易引发相关成本上升而影响经

济。

《21世纪》：开发老年人资源，发展老年产业，是否会形成新的增长点？

李军：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年产业会形成新的增长点。理论上讲，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发展老年产业的潜力越来越大。但是，由此能否形成新的增长点，要取决于经济中多方面的具体条件。其中，老年人的购买力情况是重要的因素，有购买力且有愿望购买的需求才是有效需求。就短期而言，老年人的有效需求尚不足以支撑形成新的增长点。

老龄化是否有利于提高总消费需求，还难以给出定论。从全局来看，老年人规模的扩大对应的是劳动人口规模的相对减小，其结果是劳动力需求的相对下降，综合结果是增加经济总需求还是降低总需求，取决于一些有关的经济参数，如老年人与劳动力的消费倾向的差异。

从局部来看，老年产业即使可以成为经济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但在总体上的平衡结果看，其效应也未必能带动总体经济增长。因为老年人是从劳动力转过来的，老年人越多就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相对越多，因此不利于劳动力群体消费的增加，即在老年人群体消费与劳动力群体消费之间存在一种替换效应。如果老年人的购买力不及劳动力，那么这种替换效应的结果主要是总体上降低消费需求。

总体上看，由于中国老年人作为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不够，短期内要使老年产业发展并成为新的增长点是很难的。为此需要国家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乃至国有资产配置等方面做多方面的工作。当然，老年产业的发展是具有结构性的，老年人可能在旅游、护理等市场方面发挥显著的消费带动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老年产业还不能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亮点。

### 多生孩子不能延长人口红利

《21世纪》：多生孩子是一个解决办法吗，能否延长人口红利，或者移民增加人口？

李军：前面已经谈到，多生孩子的意义主要在于改善家庭结构，因此其意义也不在于延长人口红利。短期内靠多生孩子来延长人口红利也是并不现实的，因为孩子出生后一般要经过十多年的成长才能成为劳动力。如果

孩子要接受更多的教育,如上大学,参加实际工作的时间还要拖后,所以在短期内多生孩子的结果是增加负担,是加剧人口红利的减少。

即使从长期来看,由于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而导致老年人数量相对增加,多生孩子也阻挡不了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状况的出现,多生孩子只能是在一定限度内缓解老龄化进程。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人口红利的局面将不会再现。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不可能通过移民来解决中国总体的人口结构问题。当然,局部地区可以通过适度移民的方式缓解特定地区的劳动力不足,这比较适用于一些边境地区。但就中国总体而言,移民是不可行的。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是世界性问题,从长期来看,随着各个国家老龄化程度普遍提高,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年轻劳动力大规模移民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像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移民到中国,更谈不上可以影响到中国的人口结构。预计到2050年前后,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3.6亿多,届时要把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降到20%左右,大体估计约需要补充三四亿人的年轻劳动力,试想有哪个国家可以输出这样巨大规模的人口?

《21世纪》: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能否借鉴?

李军: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这样人口规模的国家进入老龄化,因此不存在完全适用的国际经验。了解和学习日本等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措施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但不能照抄照搬,特别是不能总拿美国的经验说中国的事。

中国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应对策略。如果不能及早而正确地应对,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会比现在西方国家出现的情况更严重。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

《21世纪》:人口老龄化各地不一样,农村与城市不一样,对此怎么看,各地情况不一样,应对的方法不一样吗?

李军:人口老龄化是长期性问题,现在谈论应对老龄化的意义主要是提前做准备。短期内,由于地区间存在着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使

劳动力尚有一定的流动空间,从而地区间的劳动力供给有一定的互补性。但从长期来看,如果全国各地老龄化程度趋向均衡,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明显缩小,劳动力流动性将显著减弱,从而通过区域间人口流动解决老龄化问题的空间越来越小。由于不同地区的情况可能不同,应对方法不能一刀切,不能一概而论。农村地区收入低,应对老龄化问题会更复杂和困难,更需要特别重视和加强应对。

总而言之,对老龄化问题的认识目前仍主要停留在养老、社会保障、人口红利、就业等层面,而对经济各方面影响的深入认识仍很不够。

认识问题至关重要,只有充分认识到人口老龄化是重大经济问题,而不是单纯的社会问题,更不是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才能真正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这是加强从经济层面应对人口老龄化工作的前提。

(转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21 世纪经济报道》)

## 公积金制度日益凸显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评议员

山东省济宁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山管理部近日首次公示辖区各缴存单位人均月平均住房公积金缴交额,结果显示最高的单位与最低的单位相差高达 27 倍。

看似惊人的 27 倍差别其实不过是公积金制度日益凸显碎片化的一个缩影。我国公积金制度从开始实施时,就缺乏明晰目标引领下的系统性规划,至于设计初衷,更是早已被消解在花色各异、来源不一的“补丁”中。

那么公积金制度设计初衷又到底是什么呢?追本溯源,这一 1991 年 5 月创始于上海倒逼下的举措,试图通过“国家支持一部分、单位补贴一部分、个人合理负担一部分的住房货币化分配和住房筹资新机制”,打破长期

以来住房由国家和单位统包的格局。

这种其后被迅速推广至全国的制度设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主要是为了——并且也是可以——帮助解决困难职工家庭住房问题。但是中国迅速变迁的经济社会很快导致公积金制度目的与手段出现脱节,这其中,最主要的变化来自两个方面,即,一方面,市场化途径很快成为住房供给与获得主要甚至唯一的渠道,再加之房价在此过程中一路飞扬,因此,公积金制度如欲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必须不断加大资金归集力度(提高缴存比例上限)。

另一方面,上述住房制度快速演变的同时,中国发生的另一项更为本质性的变化是,不同地区、单位、阶层开始出现分化,而这种分化趋势与公积金制度共同嬗变的结果就是,曾经全心一致“扶危济困”的公积金制度被各种客观存在的个体标识撕裂得面目全非。不同地区、单位、阶层越拉越大的公积金缴存基数与比例差别事实上使得公积金制度反而成为财富分化的扩大器。低收入人群基本休眠的公积金账户余额以贷款形式支持了高收入人群购房,而房产增值恰恰正是近十多年来中国家庭财富积累最重要的变量。当然,正是因为有感于公积金制度有可能走向其初衷的背面,2010年起各地开始探索利用公积金贷款支持建设保障性住房。不过平心而论,这种又一次看似本意良好的制度修补起码存有大量待商榷的疑点,甚至或许加剧公积金制度碎片化趋势。其真正系统化的、顶层式的改进,显然更应该是彻底重审公积金制度存在的目的、手段,在充分尊重公积金私产性质基础上,从头建立起一揽子覆盖缴存会员住房、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性需求的补充性强制储蓄制度。

(摘自《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39期)

# 郑秉文：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亟须顶层设计

金 辉

**《经济参考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多项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框架日益健全。城镇居民养老、医疗等各项保障都有所加强，农村居民的各项保障也逐步纳入了社会保障体系中。请您谈谈这十年来，我国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方面取得哪些进展？

**郑秉文**：十年来，社会保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中国国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一是进入社保制度的人数越来越多，社保覆盖面越来越大，受益人数越来越多。2005年以来，社保制度建设进入快车道，共有20多项新政出台，尤其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农保”和“城居保”等建立，在制度上消灭了死角，实现了全民覆盖，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的目标不断推进，截至2011年底，基本医疗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参保人数合计超过13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已达6.22亿。

二是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国民确实得到实惠，社保待遇已不可或缺。养老金已连续8年上调，年均上调幅度超过13%，基本与城镇在岗职工工资增长率指数化挂钩，2011年月人均达1517元，是2005年713元的两倍以上，高出同期CPI涨幅的10个百分点；在医疗保险方面，城乡3个制度（城镇职工、城镇居民、新农合）的报销比例逐年上升，截至2011年底已分别达77%、62%和70%；低保标准已从2005年的月人均154元（城镇）和74元（农村）提高到2011年的288元和140元，增长幅度均为87%。对社会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增长十分明显，2011年高达1.4万元，由此成为提高待遇水平的有力支撑。

虽然中国社保制度的方针早就确立为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但由于种种原因，“多层次”的制度结构一直处于失衡状态，第二和第三支



柱严重滞后,在退休收入的替代率上小得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城镇居民的退休收入结构中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保险的收入就占绝对优势地位,人们对第一支柱的依赖性自然就越来越大,甚至成为绝大多数城镇居民的唯一收入来源。

**《经济参考报》:**现在老百姓都意识到社会保障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任何有关社会保障的话题都会成为全社会最关注的焦点,前段时间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您如何看待延迟退休这个问题以及其背后的问题?

**郑秉文:**进入本世纪以来,每一次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都是不经意由一句话或一个普通的表述引发,比如,此次引发讨论的一个直接诱因,是6月7日人社部在答复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

在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声音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的现状进行攀比,进而表达对社会不公的不满,甚至认为,公务员和事业单位本来就没有参加养老保险改革,他们不用缴费,但养老金水平却高于企业一倍以上,如再让企业工人延迟退休年龄,这显然是公共部门在寻租。

出于对退休“双轨制”和碎片化的强烈不满,反对延迟退休年龄的言辞十分激烈。表面上看,延迟退休年龄涉及的只是个人的切身利益,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制度没有较为直接的相关性,但是,互联网上出现的一面倒的反对理由均来自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双轨制”。由此看来,延迟退休年龄的改革阻力不是来自提高年龄本身,而是更多地是来自对社保制度的不公平和改革的“碎片化”的愤慨和无奈。

回顾总结近年来社保改革受阻的深层原因,我们看到,制度“碎片化”仍是当前深化改革的大敌,是当前社保制度存在的一个“软肋”。未来,机关和事业单位有可能成为社保制度的一个改革前哨,“双轨制”有可能成为所有反对养老金制度改革的第一个屏障。换言之,对社保制度碎片化和多轨制造成的社会不公及其社会不满情绪,将会代替任何的理性改革,即社保制度的公平性没有解决,其他任何改革都会被搁置起来。

**《经济参考报》**：既然我国社保制度存在这些问题，那么您认为下一步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哪里？

**郑秉文**：毫无疑问，由于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和当期每年扩大覆盖面导致的基金增量，养老保险制度的当期支付能力较强，近年来每年的制度收入都大于支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压力似乎不是很大。但是，中国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仅为15年，还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退休年龄平均比发达国家晚10多年，而寿命预期仅小2-4年；所有这些制度参数毫无疑问都将告诉人们，长期来看，这个制度的财务风险是巨大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调整参数是必须的，而提高退休年龄则是唯一可行的。人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可能永远是10%，财政收入的增长率也永远不可能是20%~30%，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转移支付也不可能永远像现在这样不讲代价、不讲预算决算，尤其是，希腊的教训说明，任何国家基本养老制度的最终出路均来自自我平衡机制，在人口老龄化面前，这个自我平衡的一个重要“杠杆”就是在退休年龄与人口寿命预期变化之间“楔入”一个固定的联系机制。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男女平均寿命预期到2020年是74.7岁（发达国家是78.8岁），2040年是77.9岁，2060年是80.3岁。为了适应未来人口寿命预期的提高，十几年之前发达国家就开始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他们或是在既定现收现付制下提高退休年龄，或是通过引入个人账户和建立积累制，改变制度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应对老龄化的压力更大，其途径无非是微调退休年龄这个参数，在制度设计上要增加相应的激励机制，以达到鼓励提高退休年龄的目的，或改变制度结构，建立“真实积累制”或“名义积累制”，二者都能达到最终让何时退休成为个人退休决策的目的。

《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就指出，“建立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与缴费情况相挂钩的参保缴费激励约束机制”。这句话，既有参数式改革的含义，也包括结构式改革的意思。

**《经济参考报》**：这些改革是否需要顶层设计？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说这个时髦的词，那么社会保障改革顶层设计缺位的根本原因何在？难道我国

的社保制度改革就那么难吗？郑秉文：如果说 20 年前“摸着石头过河”可以成为设计和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发展战略的话，那么，改革到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完整、精准的一揽子顶层设计，社保改革将出现许多反复，甚至出现倒退，进而有可能引发社会问题：

第一，制度前途没有预期。作为目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核心标志，养老保险制度中的个人账户做实试点至今已经 12 年了，但仍在试点过程当中，有些试点省份（比如上海）停止了做实账户进程，有些省份（例如辽宁）开始透支账户资金用于当期统筹资金的缺口，以保证养老金的当期发放；总之，没有任何人知道试点的终点在哪里，前进没有方向，后退没有退路，制度建设没有预期，部分积累制处于两难境地，人们站在河中，摸着石头茫然。

第二，债务缺口没有测算。从建立制度之初到今天，中国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完整和中长期、官方和相对可靠的债务精算报告，隐性债务和显性债务的测算至今没有准确统计，制度运行的近期、中期和长期财务预测从未发布过报告。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似乎都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可以比喻为没有石头可摸的一条河。

第三，改革进程没有步骤。社保改革至今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没有一个详尽的案头设计，几乎所有步骤和政策都是随机和临时的，例如，任凭类似延迟退休年龄的话题随时随地成为全社会的热议焦点，任凭 2008 年 2 月启动的五省市事业养老金改革或流于形式，或无限期拖延，或被社会所诟病；任凭 3 万多亿元社会保险基金几乎完全放在银行，承受着巨大的负利率。

第四，改革方向胸中无数。社保制度知识比较专业化，制度和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应有一个明确的目标追求或模式追求。但事实上却远非如此，类似社保基金投资体制选择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改革领域，均经常受到互联网等非专业性的舆论左右。网络舆论的导向常常替代严密的案头设计。我们应该知道，养老保险改革周期很长，一代人就是几十年，我们是试不起的，更失败不起，也不能没完没了的长期处于试点的临时状态。

第五,部委之间缺乏协调。养老保险是多层次、多支柱的,是缴费型和非缴费型交叉互补的,是二次分配的一个子系统;所有这些,不是一个部委能够完成的,而需要多个部委通力合作,相互协调,需要高层高度重视,敢于担当,统揽全局;但多年来,部委之间的跨部委协调严重缺位,很有些重要的涉及到社保制度重大政策的几个方面始终未能如愿尽快出台,制度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人民福祉受到极大漠视和挑战,部委博弈常常让位于人民利益。

可以这样认为,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大讨论,反复出现,屡遭争议,均为缺乏顶层设计的表现。其实,如同许多国家那样,社保改革应注重案头设计,制定严谨的宣传攻势,精算未来几十年,一揽子计划十分严密,一次启动成功,以防止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体制改革流产的类似情况发生。

(转自 2012 年 10 月 12 日《经济参考报》)

## 【文化阵地】

# 中国文化思潮的百年嬗变

胡一峰

百年来的中国,时时刻刻处于中西交汇、新旧冲突之中,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历史图景浓缩在近代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之中,对百年来的社会思想造成颠覆性猛烈冲击,持久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深层文化心理。

## 中西之争、古今之争

作为有着 5000 多年历史、地域辽阔的古国,中国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形成,以先秦的诸子百家学术为源头,其间不断融合了各历史时期、中华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以儒、道、佛思想为主流的

中国传统文化。

由于1840年、1860年连败于来自欧洲的入侵者英军、英法联军,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再败于同属于东方的日本,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积极地为中國寻找富国强兵出路的同时,一部分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

一种意见是晚清张之洞为代表的著名的“中体西用”,即在保留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技术,这被证明走不通;而另外一种激进的思想则是全盘西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三纲五常、封建礼教,甚至是吃人的、是落后的,应该用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改造中国文化。

1919年前后,《新青年》以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聚拢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树人和周作人兄弟等一大批文化新锐,他们向社会大众宣扬一种“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的新文化,希望唤起沉睡的人们,去打破沉闷黑暗的“铁屋子”。文化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从来没有像这时发挥得这么充分。

新文化运动,如其旗号所示,是以传播新文化为志业的。但這些以“新”为标识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元素上又深深烙着一个“西”字。实际上,在民国初年的“趋新尊西”人士看来,“新”与“西”之间并没有太实质的文化区别。他们认为:“所谓新者无他,则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之文化也。”这无异于认为人类文化发展是一元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所谓文明国家的互相厮杀,使一些欧洲学者、也包括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的资本主义思想感到失望,转而到东方文化里寻找人类问题解决方案。于是关于东西方文化论战在20年代又演变成了“科玄论战”:以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是东方文化派;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等人为代表的“科学派”是西方文化派。

20世纪30年代,玄学派主将、现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张君勱再次揭起民族文化的大旗,与当时的学界名宿联名发表文章提出对中国固有文化应“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一时间,建设本位文化的呼声占据了思想舆论主流。后来被视为“全盘西化论”代表人物的陈序经和胡适则分别撰文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无非是中体西用的翻

版而已,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仍在西化。于是,一场关于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论争由此展开,形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又一次文化讨论热潮。

时光转入 20 世纪 40 年代,冯友兰、贺麟等汇通中西文化大师在艰苦的物质环境中认真思考着民族文化的前途,运用西方理论武器整理中国固有文化,把中国文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同样是在 20 世纪 40 年代,远在“中国西北角”的中国共产党人也在按照自己意识形态的学理逻辑思考着同样的文化命题。1940 年 1 月 9 日,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表明了共产党人的文化立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既要吸取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又要吸取外国的进步文化。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不久,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大举除旧布新,知识分子被要求改造自己的思想,各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受到体无完肤的批判。随着意识形态一律局面的达成,争论多年的“古今中西”的文化难题似乎以一种非文化的方式宣告终结。但没过多久,一场以“文化”为名的所谓“革命”狂飙而来,家长制、血统论、山呼万岁等早已在辛亥时期就已经被人们唾弃的专制主义文化,穿上时兴的“革命”外衣,再次粉墨登场,反过头来“革”现代文明的“命”,带来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正因为如此,“拨乱反正”后的人们深刻认识到启蒙并未完成,新文化运动诸贤们面临的难题依然拷问着当下的思考者,中国走向现代所面临的文化难题还需重新求解。

###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

在中西文化之争过程中,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思想在中国得到传播。与此同时,作为西方文化思潮之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红色文化”,并成为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

中国人早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但马克思主义真正传入中国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事,是作为救国的思想武器引进的,并一度空前兴盛起来。1927 - 1937 年的 10 年,被史学家称为“红色的 30 年代”。而上海与延安,则是红色文化的两大发源地。

随着 1930 年 3 月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红色文化悄然兴起于上海。当时几乎所有的文化艺术领域都有倾向左翼的青年人,音乐、电影、教育、新闻

等也都存在过一些左翼的小组。同时,各种红色作品也大量涌现。

20世纪30年代苏维埃运动时期,江西等地的革命根据地中一派俄国风情。留苏学生对苏俄照猫画虎、亦步亦趋,使红色文化以一种滑稽的形式在苏区铺天盖地存在着。经历了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则痛定思痛,从中国古文献中独具匠心地拈出“实事求是”四字,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强调民族形式、科学内容、为大众服务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青年人心目中的圣地,上海等地的左翼青年汹涌奔赴西北。据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统计,仅1938年就有1万余人从这里获准去延安。他们的到来,壮大了“延安知识分子”群体,也加速了上海和延安的红色文化的合流。

新中国成立之后,延安知识分子们成为全国宣传文教领域的领导者,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文化上向红色文化自觉“投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中国民主同盟主席费孝通先生生前曾回忆过这一段心路历程:当时,知识分子认识到过去的一套没用了。“我们是文化投降的,我们代表这个知识分子阶层自己投降了,而且不是一个人的意识,也是真心诚意的。”

从20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直至进入新世纪,政治舞台风云变幻,红色文化潮起潮落,从90年代的毛泽东热,到今天的“唱红歌”,但始终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显然,在百年的文化嬗变中,红色文化已演变为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而且是一种最具活力和大众性的传统,融入当代中国人潜意识深处。

### 文化日渐走向多元

辛亥革命不仅是把满洲统治者赶下龙庭、在政治上终结了延续千年的皇权统治,而且在文化上颠覆了皇权的基础,把人们的思想从帝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文化嬗变相表里的,是自由精神的大解放。辛亥革命,唤起了作为个体的中国公民和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普遍意识觉醒。从此,各种主义、各种思潮都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供国人思考和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原有状态被打破,开放、多元化成为这 30 多年来文化格局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国门打开,“萨特热”、“弗洛伊德现象”、“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尼采现象”、“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纷纷成为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社会讨论最热烈的问题。

进入 80 年代,港台流行歌曲和港台言情、武侠小说一起进入内地,在大众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中国的大街小巷。台湾的校园民谣、香港的四大天王,都成了通俗文化的热点。

进入 90 年代,人们被新一轮改革大潮及取得的成就所鼓舞,因而再一次把关注的视线从乌托邦式的政治梦幻转向了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于是,知识分子所关注的文化哲学思潮逐渐远去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管理、公共关系、外贸商务。但同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潮也开始在中国弥漫。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更多地参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后,中国与西方利益发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冲突,这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再次对西方大失所望。于是,民族主义感情开始升腾,国家利益、民族共同体的命运成为人们关注的目标。这种民族主义思潮,主流是爱国主义,与狭隘的西方所谓的“民族主义”有着根本的不同。

伴随民族主义感情升腾的是“国学热”的兴起。1992 年邓小平南方视察以后,“经商热”一下就吹遍了全国,就是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但是,人们很快发现,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准普遍出现了滑坡的局面,甚至还滑得非常严重。因此,社会上很快就出现了“寻找道德”的思潮或“国学热”,大家希望从中国人自己的国学中去寻找解决市场经济下道德滑坡的良方。北大一批老教授,如张岱年和季羨林,他们觉得光靠马列主义教育学生是不行的,应该与国学结合起来。到 2003 年,中国已经有 500 万个家庭在提倡少儿读经,有 50 个大城市在进行少儿读经的经验交流。2005 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国学院。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特别是网络文化的飞速发展,使得大众文化特



别是老百姓消费的文化,为普通群众所钟爱的文化,不符合高雅的价值评判标准,是一种俗文化。近年来,“超女”、街舞、网络歌曲、DV短片等在社会上占有很大的市场。虽然大众文化对丰富国人文化生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导致整个社会底蕴较单薄,内涵不够丰富。

可以预料的是,随着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趋势将更加明显,文艺形式也将更加丰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文化变迁表明,只要保持开放的心理,中国文化就能迎来更光明的未来。

(转自2012年12月26日《今日中国》)

## 2012年十大文化新闻

付小悦 谌 强等

时光如白驹过隙,又一年即将过去;文化总是润物无声,有多少新闻让人难忘。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让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形成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岁末年终,让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年值得记住的文化事件。

### 1.《讲话》发表70年,“为人民”仍振聋发聩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各地各界召开座谈会、众多报刊开设纪念专栏、艺术家们畅谈体会,令人们再次重温党领导文艺事业的这第一部经典性理论文献。当年,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中,《讲话》深刻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等重要问题。在今天的现实、文化语境中,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之际,重温《讲话》,其中“为人民”

的思想精髓仍极具指导意义。文艺如何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如何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建设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是新形势下继承和弘扬《讲话》精神，必须面对的命题。

### 专家点评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70年来,中国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不断地思考和重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思想精神价值,虽然时代变了,有些提法变了,但《讲话》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今天我们要学习70年前的《讲话》,就要学习那种直面时代、直面现实、解决现实重大问题的勇气和精神,同时学习勇挑历史重任的精神。从这一精神出发,来重新认识作家、知识分子如何深入生活和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创作原则。

## 2. 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全面完成

2012年,依照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加快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精神要求,各地各部门按照重塑文化市场主体的目标,以转企改制为中心环节,加强资源整合,加快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工作,这一改革任务已全面完成。

截止到目前,全国承担改革任务的580多家出版社、3000多家新华书店、850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57家广播电视系统所属电视剧制作机构、38家党报党刊发行单位等已全部完成转企改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在全国2103家承担改革任务的文化系统国有文艺院团中,2100家已完成改革任务,占总数的99.86%,其中转企改制的占61%。同时,转变演艺发展方式迈出大步伐,国有和国有控股的骨干演艺企业不断涌现,目前,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组建了省级演艺集团公司,其中多家实现注册资本或年收入超亿元。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69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29万多个。一个以企业为主体、事业为补充的新型演艺体制格局基本建立。

### 专家点评

李秋立(文化部政策法规司副巡视员、文化部改革办副主任):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任务中,国有文艺院团体体制改革是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决策部署的一项重点,符合演艺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既坚持了以转企改制为中心环节,又充分考虑到不同艺术品种的实际情况,充分体现了改革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针对性。只有从体制上进行根本性变革,推动大部分国有文艺院团成为合格演艺市场主体,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模式,才能真正激发国有文艺院团的活力与创造力。

### 3. 莫言获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北京时间 11 月 11 日 19 时许,瑞典皇家文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莫言因此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莫言此次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理由是“人与幻觉现实主义的融合”。瑞典皇家文学院当天在一份新闻公报中说:“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12 月 10 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音乐厅,莫言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手中接过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莫言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从 1981 年开始小说创作,代表作有《红高粱家族》、《檀香刑》、《丰乳肥臀》、《蛙》等。其作品多次获得国内和国际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

### 专家点评

贺绍俊(著名文学评论家):莫言是一位风格独特且鲜明的作家,他写小说仿佛就是在一个自由的王国里纵情狂欢,他的叙述是如此汪洋恣肆,他的想象是如此诡异奇特,而他的文学王国里又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他无疑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样本,因此他丝毫无愧于诺贝尔文学奖。国学大师饶宗颐说过,21 世纪应该是一个“中学西渐的年代”。莫言被诺贝尔文学奖所承认,正是“中学西渐”过程中的一个醒目路标。

#### 4. 中国文化走出去成果显著

2012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步伐日益加快,在海外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影响。2012年的海外“欢乐春节”活动更加品牌化,在全球82个国家和地区的144个城市举行了320多项各类文化活动,吸引了国外众多高级政要和约3000万外国民众和华人华侨的热情参与。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全球各地的中国文化中心从9个增加到13个。2012年,文化部联合外交部等部委,从5月至12月在我国共同主办了“2012非洲文化聚焦”系列文化活动。2012年,纽约中国龙年新春音乐会、悉尼春节大巡游、中欧文化对话年、中韩友好交流年、中泰一家亲等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在世界各国蓬勃展开,吸引了世界各国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热情关注。2012年,中文版文化传通网、英文版中国文化网共同迎来了开通十周年纪念,吸引着全球各地越来越多的各国网上读者和用户。

##### 专家点评

侯湘华(文化部对外联络局局长):2012年,在党和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全社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世界上产生了十分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 5. 故宫换掌门出台新举措

今年初,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走马上任,提出几项“新政”:其一,故宫清退了端门地区的全部商户和临时展览,建成28个售票处,确保该地区使用的公益性。其二,力争在2016年前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以使红墙内在夜间成为完全封闭的安保区域,而白天则是对公众开放的参观区域。全部规划完成后,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的面积大约占全部面积的76%,开放区与非开放区的比例将达到8:2。其三,在故宫南部打造一个“金三角”博物馆群。午门、雁翅楼在修缮完成以后,可以形成一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展厅,能安排具有社会影响的大型专题特展,或国际著名博物馆的大型展览。其四,完善故宫的安防设施,“故宫的安全设施和技术手段必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 专家点评

单霁翔(故宫博物院院长):其实,我不是“掌门人”,只是“看门人”;我也没有什么“新政”,只是前任已经把各项工作的前期都准备好了,我来正赶上吹哨!面对故宫,我心怀敬畏,作为“故宫人”,保护好故宫文化遗产,建设好故宫博物院,更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整理)

## 6. 中华书局百年华诞

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百年间,以“开启民智、教育为本,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己任的中华书局,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性符号在历史上留下深深印记。

1912年,在25岁的创始人陆费逵主持下,中华书局版《中华教科书》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问世,随即风行全国。自1916年起,中华书局组织100余人编写大型工具书《辞海》,自1936年开始发售,风行十几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诸子集成》、《太平御览》、《全唐诗》等大批经典古籍。1978年之后,中华书局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典籍,仅1980年,中华书局就出版新书137种,重印52种。2005年,中华书局实现销售码洋9612万元,利润322万元,市场化路径也逐渐明晰。目前,中华书局已形成了古籍整理和学术著作、大众普及读物、中小学教育、汉语工具书、文化遗产和艺术5大类出版格局。

### 专家点评

李岩(中华书局总经理):我们关注国民教育,我们关注中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我们由衷感念一代代作者,将他们一座座著述的丰碑,融入书局百年基业。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珍视历史和传统的时代。整理与复原中国典籍,商量旧学,培养新知,是我们的自觉。为社会提供绵久的书香,我们当凝神聚力。

## 7. 北京人艺成立60周年

2012年6月12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迎来了60岁生日。60年来,北京人艺上演优秀剧目300多部,演出场次数以万计,不仅留下一大批经典剧目,也培养了众多受观众喜爱的优秀艺术家。

上个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北京人艺以演出郭沫若、老舍、曹禺的作

品而闻名。著名戏剧家焦菊隐先生曾担任剧院总导演,培养出了以于是之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表演艺术家,创作出《茶馆》、《雷雨》、《蔡文姬》以及外国剧目《怪吝人》、《伊索》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进入新时期,北京人艺相继推出了《小井胡同》、《天下第一楼》等剧目,并组织了《龙须沟》等经典剧目的恢复上演。1982年,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在北京人艺一个排练厅里吹响了“实验戏剧”的号角。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大量的西方剧目开始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出现,西方当代剧目与中国本土实验剧目一起,为北京人艺的创作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 专家点评

张和平(北京人艺院长):北京人艺有句老话“拉开大幕是真的”。这几年,我们一方面复排了10余部经典剧目,一方面推出了《窝头会馆》、《知己》、《喜剧的忧伤》等新戏,它们既保持了人艺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又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目前,北京人艺上下已经形成了共识:要在继承中发展,为了发展而继承。(光明日报记者苏丽萍整理)

## 8. 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重设

国家文物局重设的《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11月17日公布,更新后的名单共45项,涉及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名单呈现三个显著特点:一类型扩展,二打包项目成为常态,三涉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项目大幅增加。名单重设主要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是各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热情持续高涨,多个省市向国家文物局申请将一些价值突出、申遗潜力大的文化遗产项目列入预备名单。同时,世界遗产委员会关于世界遗产的申报要求越来越严格,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的遗产类型日益受到重视,原有的预备名单中新型遗产数量较少。另外,相当一部分原预备名单项目地方政府未予重视,申遗工作没有实质性进展,不具备近期申遗的基本条件。

### 专家点评

童明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预备名单采取动态管理,对于因保护管理不善,致使遗产价值受到损害的项目,国家文物局将酌情予以警示,情形

严重的,可以将其从《预备名单》中除名。

## 9. “舌尖”引热议

2012年5月14日在央视综合频道首播的七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和热烈反响。不仅多轮播出收拾率屡创新高,还引发了社会对美食、民俗、文化认同等话题的热烈探讨。这部纪录片更带来了商机。地方特产、锅碗瓢盆热卖,打着“美食之旅”旗号的旅游线路成为热门。一部纪录片火爆了媒体、商家和产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无独有偶,《中国好声音》的走红和《舌尖上的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妙。浙江卫视引进全球热播的《thevoice》,节目一开唱,便以创新的节目形式和真挚的声音和情感艳惊四座,被网友誉为“耳尖上的中国”。

### 专家点评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电视节目走红,在于满足了观众特定的文化需求。《舌尖上的中国》将“吃”还原到家庭、乡村、邻里关系这些传统层面上。深厚的文化内涵不仅感染了观众,也为中国电视作品创作找到了发展方向。(光明日报记者李蕾整理)

## 10. 元上都遗址入选《世界遗产名录》

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元上都遗址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2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元上都遗址作为草原都城遗址,展示了文化融合的特点,见证了北亚地区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之间的碰撞及相互交融。元上都是著名的忽必烈汗称帝前的“龙兴之地”,13至14世纪元朝的夏都,也是元朝格局最完整、保存最完好的遗址。它的入选,不仅有利于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的类型平衡,也是中国多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多样性作出的贡献。

### 专家点评

刘新乐(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元上都遗址申遗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保护是整体工作的重中之重。我们要切实履行守护全人类共同遗产的庄严承诺。要继续鼓励自治区文物考古、博物馆等部门,与相关国际组织开

展文物保护、考古、展示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转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光明网)

## 【历史回顾】

# 古代地方大员权力演变镜鉴

张 涛

宋代思想家程颢曾在《下山偶成》一诗中说到：“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于此感慨地方官员，尤其是地方大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回溯中国古代地方大员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在不同历史时期职位与权限的变化，无疑会对“地方大员”、“封疆大吏”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

## 秦、汉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体制

就现有资料而言，夏、商时期的地方行政体制显示了早期国家对地方管理的原始性，此时期的方国（或者称诸侯）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与后世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西周统治者在前人的基础上，推行了一套较为严密的外服诸侯体制。战国时代，一些新的地方行政组织开始形成。随着郡县的设立与推行，其长官郡守、县令逐渐成为控制一方、有相当自主权的军政长官。

秦统一六国后，在地方全面推行郡县制。两汉虽自始至终延续着汉高祖刘邦所创立的郡国并行的基本格局，但却不否认郡县制在地方行政体制中的主导地位。“郡”作为秦汉时期重要的地方行政机构，其主管长官——郡守（汉景帝时更名为太守）有着相当大的职权。郡内的任何事务，都会受到郡守的管理。汉承秦制，亦以内史为京师最高行政长官，后在汉武帝时发展为“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共同负责管理京师及其附近地区。



东汉迁都洛阳后，治京师的长官则改为河南尹。总之，作为秦汉时期集行政、司法、军事、财政于一身的地方大员，郡守虽然会受到丞相、御史大夫的监督（汉武帝后还受刺史的监督），但因为其对于属吏有任免与荐举权，故而属吏与郡守往往形成一种生为之服役，死为之服丧，同进退，共荣辱的人身依附关系，久而久之，不仅容易造成吏治的腐败，更会助长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这也成为东汉末年出现军阀割据局面的一个主要原因。故而，郡守的品格、素质、能力、信仰，对于地方政治的好坏起着决定性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行政体制在秦汉郡县制的基础上逐渐演变为州、郡、县三级制。州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其长官一般为刺史。刺史虽为地方大员，但其职权却是“因时”、“因地”而异。理论上而言，都督管军事，刺史理民政。但如果二者兼任，其权力必然大增。所以与秦汉时国家一统、政局稳定前提下的郡守不同，魏晋南北朝战乱割据、士族专权背景下的刺史，其实质多为手握兵权的军政长官，而其所言所行影响的并不仅仅是地方的民生吏治，有时更决定着国家政局的走向。曹魏的“淮南三叛”、西晋的“八王之乱”、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都反映了中央与地方的紧张关系。

### 隋唐五代与宋朝的体制变迁

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地方行政体制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秦汉以来的州（郡）、县二级制逐渐发展为道、州、县三级制。隋代及唐前期，州的行政长官刺史（隋炀帝与唐玄宗时两度改州为郡，州刺史改为太守）肩负着重要责任。除州刺史之外，都督府（总管府）的最高长官也是此时段内颇有权势的地方大员。都督府（总管府）是州的一种特例，其长官总管（都督）在承担军事事务外，可兼任驻地的刺史，负责本州以内的行政。唐玄宗开元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划分了15个具有监察性质的“道”，将其长官采访使较固定地留在任上，并按照地方长官例上奏中央。这样一来，采访使实际上成为了“道”的行政长官。同时，由于政府锐意边事，唐初辖地方军民二政的都督刺史发展成权力更大的节度使。宋有鉴于唐末五代之弊，将地方的军权、财权、司法权等收归中央，由此彻底结束了藩镇割据的局面。在地方上，实行府州军监、县二级制。其中，府、州、军、监是同级机构，由朝廷以“权知某州

（府、军、监）事”的形式直接委派。作为地方大员，知州掌管州内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诸多事务，并可直接向朝廷奏事。然而，相比秦汉时的州牧，知州的权力要小得多。知州不法，通判可上告中央。总之，宋代虽以府、州、军、监的长官直接管理地方，但又以路级政府给予监督，因此宋代的地方大员在行政、财政、军事、人事等方面可操控的范围较为有限，这深刻体现了天水一朝“强干弱枝”的治国理念。

### 元、明、清时代的权力膨胀

蒙古族起自漠北，相比汉族文化水平较低，蒙族统治者们尚未建立起设定严格的地方行政机构，地方管理系统军政、民政不分成为当时的最大问题。忽必烈即位后，先后设立宣抚司、总管府，管理地方的军政民事。同时，又进一步设立行中书省管理民政。到元成宗、武宗时，行中书省作为常设地方行政机构成为了定制，行中书省的最高长官虽屡有变动，但并不妨碍其成为毋庸置疑的地方大员。行中书省的长官虽在品级上低于中书省，且权力上受中书省或枢密院的节制，但自从元成宗元贞年间以各行省的平章政事兼管本省军政后，地方的军民管理权就完全集中于行省的最高长官手里。而元朝并没有随之建立起一套严密完善的监察体系，这种“绝对的权力”就为地方高官的腐败提供了温床。

明代虽承继元制，但其地方行政体制更加严密。明初废除了元时权力过大的行中书省，改置布政使司，下设左、右布政使，总掌一省之政令。同时，又设有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别负责一省之刑名按劾与一方之军政。三司长官在品级上虽有差别，但同为地方大员，彼此分权独立，各自直属中央。明朝中后期，随着南倭、北“虏”以及各地农民起义纷起，地方分权的原则越发不适用于时局，所以就有了巡抚、总督的设立。巡抚虽总揽一方军政，但名义上并不是三司的上级机构，且还要受到巡按或者其他钦差御史的监督，此时的巡抚还并不能完全视作执掌一方的大员。相比巡抚，最初因军事需要而设立于边疆地区的总督，其临时性更加明显。总督掌管一方，总兵、巡抚等俱受其节制。因关系到边境的治乱安危，故明朝政府对于总督的委任较为慎重。然而囿于明后期政局的混乱，总督设置作为一种制度在

当时并未完成,但却为清代总督成为地方大吏开启了先河。

清朝入主中原后,在全国范围内大体按照省、道、府(直隶州、厅)、县四级建制进行了划分。其中,总督和巡抚是省的最高军政长官,是完全意义上的“封疆大吏”。总督一般辖2省,也有辖3省或1省的,巡抚辖1省。清代的督抚除了掌有行政大权外,同时兼领兵权和检察权。虽然从品衔上来看,总督高于巡抚,但实际上二者都单开幕府,有独自奏事之权,并无正副之别。这种地方上的二元领导体制虽然带来种种不便,但清政府出于中央集权的考虑,对此并没有做根本性的调整。清末随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皇权力量的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有增无减,这直接导致了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出现了抗命朝廷的“东南互保”事件。而武昌起义之后,清王朝在短时间内的土崩瓦解也与这种督抚权力的膨胀有着深层的联系。

### 地方大员的历史认知

综观中国古代不同时期地方大员名目与权限的发展变化,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作为维持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大员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历代中央政府对其既依赖又限制。身为官僚队伍中的精英人物,一个地方大员在政治舞台上的一举一动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其背后往往体现着中央与地方力量此消彼长。

第二,虽然在专制王朝之下,以“人治”为根本标志的执政理念是历代封疆大吏所尊奉的基本原则,但不同朝代在不同阶段所形成的、彼此各异的政治文化,还是造就了不同时期的地方大员在办事风格、执政理念等方面的差异。

第三,虽然历代统治者都殚精竭虑,力图通过各种手段、制定各种措施来消除地方政治中的种种弊端,但在缺乏底层监督、民众权力衰微的中国古代,无异于井中捞月。所以古代地方大员能否做到仁政爱民、清素简约,更多时候是其自身的精神信仰与个人素质的流露,根本上并不在于制度本身是否发挥了制约作用,这是古代中国“人治”传统的一个必然结果。

(转自2012年12月24日《人民论坛政论》)

## 当年的宋朝为什么能富甲全球？

王 业

核心提示：在不折腾国策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

赵匡胤此人是职业军人出身，按理说应该好勇斗狠，热衷攻伐，重武轻文。谁料到这位宋太祖竟然是个热爱生命、热爱世界和平的好男儿，解决事情尽量避免杀戮。比如初登大宝不久，赵匡胤就在太庙的一间密室中立了一块碑，此后大宋新皇登基，都要由一位不识字的太监带到密室里瞧瞧那块碑。碑上到底写了些什么，除了皇上谁也不知道。直到金军攻破汴梁城，打进太庙才真相大白，碑上赫然书写着三条，大意是：第一，不杀柴氏子孙（后周的后裔），如果他们谋反，就在监狱里让他们自尽，不能公开杀掉；第二，不杀士大夫，尤其是那些谏臣；第三，子孙如果违背了前两条，天诛地灭。

这“勒石三戒”不仅给大宋历代皇帝划下了执政的底线，也给大宋的经济方针定下了基调，通俗来讲就是三个字：不折腾。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外能和平解决争端，就不诉诸武力；对内能调和矛盾，就不激化冲突。

在不折腾国策的指引下，大宋的经济一举超越了此前历代的各项纪录。宋朝财政收入最高的一年，达到了1.6亿贯（1贯=1000文），即使是后来失去了北方半壁江山的南宋，财政收入高的时候也能达到1亿贯。这样的收入记录在古代中国不仅空前，也堪称绝后。比如明朝在财政收入上比北宋差了整整一个数量级，清朝康乾盛世时状况稍好，但也不及北宋财政收入的一半。

宋朝平民百姓的生活也要好于其他朝代。司马光曾经痛心疾首世风日下，连农夫走卒都穿丝质的鞋子，实在太奢靡了！看看《水浒传》里的那一

百单八将上水泊梁山的原因,有因杀人放火来的,有因触犯朝廷律法来的,有游手好闲图快活来的,就是没有穷困潦倒吃不上饭来的!

这样一个安定团结奔小康的局面是如何得来的呢?我们不应该把1000年前宋朝的成绩过分拔高了,这个朝代的经济基础还是广大的自耕农们,这些农民上交的皇粮和税款,支撑起了大宋的江山社稷,骨子里大宋还是很传统的。本书第一篇已经介绍过,高产的占城稻就是在宋朝进入中国的,激发了中国人口突破1亿,人头多了,税收自然也多了。但在经济上,宋朝同其他朝代相比,有两个亮点,第一个是开源,就是海外贸易搞起来了。

原本古代中国通过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与其他国家做贸易,但宋朝建立没多久,西北的党项人就起兵造反,建立了西夏,阻断了宋朝与中亚、西亚的路上贸易通道。不得已,宋朝的对外贸易转向了东南沿海,竟然开辟出了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今杭州)、明州(今宁波)等沿海十几个沿海城市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其中广州、泉州和明州的贸易量最大,特别是泉州,在南宋时期,一跃成为当时世界第一大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南宋时每年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已经达到200万贯,占到了全国财政收入的6%。这只是官方的收益,民间也有许多人从事海外贸易,获利颇丰。

虽然不能直接从陆上丝绸之路做长途贸易,但宋朝还是积极与陆上邻国开展贸易。比如宋朝在与金、大理的交界处开设市场,对外出口药材、茶叶、棉花,进口人参、毛皮、马匹等。这些陆上贸易的收益也不容小觑。

俗话说,马无夜草不肥,虽然大宋的税收主要来源还是农业,但有了大规模的对外贸易,日子自然要比闭关锁国的那些朝代富裕多了。

此外,古代中国许多朝代的财政往往是皇族经济、战争经济、工程经济,税收收入主要是充当满足皇族奢华享受的私房钱、对外战争的军费和工程建设的拨款。这些经济类型,宋朝经济当然也都不缺,但它还有另一个亮点,就是消费拉动型经济。

前面已经提到,宋朝从赵匡胤开始就十分重视读书人,科举制在宋朝得到了发展,只要中了科举,就可以直接授予官职,这等于是给民间读书人打了一针鸡血,不用看出身,不用看门第,只要中举,前途将一片光明。科举制繁荣的结果之一,就是宋朝的文官队伍膨胀,在北宋的都城汴梁就集中了大量的朝廷官员。

汴梁城内皇族、官员、军人、商人云集,人口达百万之众,这些人的吃穿用不是附近州县能够充足供应的,于是北宋依靠运河漕运,从日渐富庶的江南地区运送大量的物资到汴梁。一船船送抵汴梁的货物,不仅有粮食,还有丝绸、茶叶、瓷器、木器等,吃喝玩乐的装备一应俱全。当时的欧洲处于中世纪的黑暗之中,美洲的玛雅人还在丛林中乱闯,大宋的汴梁城犹如地球上文明的第一灯塔,照耀着四夷蛮荒之地,令四方心神往之。

汴梁城庞大的消费力和强大的购买力,刺激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力。宋朝和古代许多重农抑商的朝代不同,它对商人的限制相对宽松,并不惧怕商人做大后威胁皇权。而经商获得的利润,要比务农高出许多倍,手工业、商业发达的国度自然要比畜牧业、农业发达的国度富裕,宋朝的手工业、商业的发达程度在历朝历代中堪称高峰,所以能够富甲全球也就不奇怪了。

(转自 2012 年 12 月 24 日网易读书)